

民营加工贸易企业路在何方?

——逆全球化新特点下的应对机制

杨春¹, 李箐², 李锋¹

(1. 沈阳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4;
2. 辽宁大学亚澳商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6)

摘要:在逆经济全球化倾向由民间掀起发展为由政府推动的新特点下, 双边或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开始肢解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和投资全球治理体制。我国民营加工贸易企业要面对因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进行区域内重新架构后被边缘化和剔除的外部冲击。研究发现, 一方面, 政府可以通过法规政策创新、管理方式创新、融资渠道创新进行制度创新改善企业外部生态系统; 另一方面, 民营加工贸易企业经营者也应发挥企业家精神, 利用市场机制通过“借鸡下蛋”链内升级、“送旧迎新”跨链转型、“东成西就”域间腾挪策略, 苦练内功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 梯度转移; 民营企业; 制度创新; 逆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F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20)03-0100-10

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20.03.010

2018年6月,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2019年9月美国宣布对华进口商品第三批加增关税清单, 2020年1月英国正式脱欧, 结束47年的欧盟成员身份。同时, 西欧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客、政党在其国内受到欢迎^[2]。逆经济全球化开始出现由民间推动转为由政府层面默许甚至主导推动的新特点。

逆全球化的新特点表现为西方一些国家为争夺在国际贸易新体制、新规则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纷纷背弃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 转而寻求建立由它们主导和制定规则的各种双边或区域性自由贸易区, 并通过“放松管制”“抑制公权”等苛刻准入条件把中国边缘化甚至围堵在外。逆全球化使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受到挑战, 中国民营加工贸易企业将面对跨国公司产业国际布局调整带来的外部冲击。

收稿日期:2019-1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金融资产价值偏离实体经济运行研究”(16BJL026);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新发展理念辽宁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提升研究”(L18DJL001)

作者简介:杨春, 男, 沈阳师范大学副教授, 经济学博士, 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和代工企业研究; 李箐, 女, 辽宁大学副教授, 管理学博士, 主要从事企业管理和企业伦理学研究; 李锋, 男,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经济学博士, 主要从事企业管理和产业集群研究。

一、经济全球化、逆全球化及其新特点

(一) 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民营加工贸易企业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在英国工业革命后得以加强的经济全球化趋势遭到严重破坏。二战后,在美国的倡导下,多个世界性国际组织(体系)相继建立,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受到各国推崇,国际经济合作日益密切,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自由度和便利度加强,国家间贸易和投资进入全球治理阶段。

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推行出口导向战略,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国际梯度转移和全球价值链的跨国分解,专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代工生产,经济跨越式进步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海空运输、计算机、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5G移动通信和AI(人工智能)等行业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为资本、知识、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突破国家和地域限制能够自由流动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WTO主导的涵盖货物、服务和知识产权的多边贸易和投资全球治理体制和规则,为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提供了制度保障。至此,经济全球化进入快车道。

在生产要素中,高级生产要素比初级生产要素流动性强^[3]。为实现生产中要素收益的最大化,“一只看不见的手”引领高级生产要素突破地域束缚,去寻求与初级生产要素相匹配。科技发展和制度创新带来的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自由化增强了要素的跨国流动,促进国际分工进入国际要素分工的新阶段^[4]。在国际分工新模式下,各国都可以利用自己在某种要素上的比较优势参与到国际分工中^[5]。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始终控制着价值链中高利润的两端,而把低技术含量和低利润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加工(组装)环节,分解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6]。

随着国际分工发展到要素分工新阶段,我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实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内劳动力大量剩余,自然资源和土地使用费用低廉,环境保护和治理意识薄弱。因此,我国凭借要素成本低的比较优势,通过“三来一补”模式,以OEM(代工生产)方式承接了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的产业国际梯度转移^[7]。中国民营加工贸易企业的雏形主要是我国沿海省份的私人作坊和乡镇企业,大多从事服装、机械零部件等初级产品的加工和装配。到20世纪末,加工贸易进出口量已经占我国进出口总量的一半多,加工贸易企业也从沿海地区扩展到全国大部分地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加工贸易企业又迎来一轮大发展,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区域已经形成了产品出口导向的完整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电子、化工等产品的生产逐渐成为主流。

2018年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27.46%。另外,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张骥指出,加工贸易企业直接吸纳超过4000万人就业。按经营主体,我国加工贸易企业可以分为外商投资类、国有类、中外合资类和民营类。外资和合资加工企业进出口额占全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量约六成,民营加工企业占三成左右。虽然,我国民营加工贸易企业进出口量对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量的贡献只有三分之一,并且企业规模普遍较小,技术和资本实力不强。但是,这些企业管理灵活,涵盖行业广,而且企业数量和从业人员众多。因此,民营加工贸易企业是我国现阶段“稳外贸”和“稳就业”工作中不容忽视的力量。

(二) 逆经济全球化及其新特点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8]。2008年,次贷危机重创美国国民经济,保险、机械制造、房地产和金融等行业一度陷入崩溃边缘。美国作为二战后公认的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推动者和引领者,其国内爆发的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全球并使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9][11]}。美国和欧洲各国内部原来固有的如贫富悬殊、阶层固化、社会不公和种群撕裂等社会矛盾出现激化,民间社会普遍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国际梯度转移和产业链跨国分解,视为本国制造业空心化、中产阶级贫困化、员工薪酬

长期停滞和产业工人大量失业的罪魁祸首^[10]。由民间发起和推动的反对经济全球化的逆全球化思潮迅速席卷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逆经济全球化是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一种反向运动,它限制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分裂国家间经济已经形成的紧密联系。但在这一时期,各国政府却依然表示要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贸易和投资全球治理体制和规则。因此,逆经济全球化还只是停留在由民间推动的层面上。

然而,2016年以来,国际环境发生了一些新变化,逆全球化趋势开始出现由政府推动的新特点。2018年4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首轮对华1300个项目价值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增25%关税的清单,且主要针对我国高端制造业。7月,第二轮对华2000亿美元6031项商品加增10%~25%关税的清单主要瞄准的是传统重工业制品及半成品。2019年8月,美国再次宣布对来自中国的价值3000亿美元3805种商品加增25%关税,主要涉及家用电器及零部件、服装及饰品等,针对的则是我国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行业。至此,按照对华进口商品依赖程度由低到高的顺序,美国对价值55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商品分批加增了关税,几乎覆盖了全部美国对华进口商品。其中,2019年8月美国公布的第三批对华加增关税进口商品清单对我国民营加工贸易企业影响最大。

在逆全球化逐渐由政府主导和推进的新特点下,双边和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肢解全球多边投资和贸易体系。中国民营加工贸易企业将在跨国公司产业国际新布局中面对哪些困境?又如何化解外部约束条件改变带来的冲击?因此,对这些问题进行及时研究会成为助力中国制造2025的重要抓手,对于我国促进产业和贸易结构优化,接长板、补短板做好加减法,有着积极的理论研究意义和巨大的实际指导意义。

二、民营加工贸易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

(一) 全球多边贸易规则改变,导致订单剧减

重商主义和单边主义贸易思想的再次出现,正在使有些西方国家着手通过建立双边或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方式进行有限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和产业链重构^[11]。这种在逆全球化中由政府推动的有一定“政治性”“歧视性”的贸易和投资区域化措施,会导致跨国公司大幅度减少对华订单^[12]。中美贸易战加速了对华海外订单和产业链的转移,2018年中国对美出口下降20.2%。2017年8月至2019年10月,新出口订单指数下降明显,连续18个月位于不景气区间(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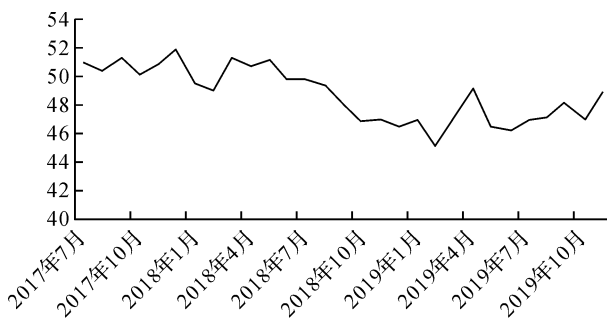


图1 2017.9—2019.10 全国加工贸易企业新订单指数

(二) 公司治理失误,转型艰难

在经济全球化中,中国民营加工贸易企业主要集中力量于产品的加工生产,很少有精力投入到企业的技术升级改造和自有品牌的创建和推广^[13]。在我国民营加工贸易企业比较集中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进行的调研结果显示:很多中小型民营加工企业的业主都有“什么赚钱就做什么”和“赚快钱”的想法,而没有对企业未来发展比较清晰的愿景,甚至认为开发新产品和自有品牌的创设是浪费金钱和精力。因此,在公司组织机构治理中,只有生产部门最受重视,产品研发等部门很少受到关注。2011年,兆信通信公司在广东东莞创立时也曾组织结构完整,专门设有产品研究和发展部,立志利用代工生产带来的“技术溢出”和利润开发出自有品牌的手机。然而,几年以后代工生产的订单开始减少,利润越来越微薄。为了维持生产的运行,企业大量消减研发部门的开支,最终失去了研发出自有品牌手机的机会。2018年,由于公司治理失误导致转型艰难,企业破产倒闭^[13]。

(三) 订单报价降低与生产成本上升,形成剪刀差

在逆全球化新特点下,发达国家倾向于与自贸区内国家进行国际经济合作。跨国公司在产业国际新布局中,可能以正在考虑对产业链进行调整为理由,对中国民营加工贸易企业故意压低订单报价^[13]。海外订单报价的降低与国内生产中原材料、土地、人工、环境保护和治理成本的上升,让企业处于破产边缘。民营加工贸易企业主要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人工成本是生产成本的重要影响因素。“珠三角”以广东省为例,2018年最低工资人民币1720元比2014年1310元上涨410元,四年间上涨31.3%。“长三角”以江苏省为例,从1480元上涨到2020元,涨幅36.5%。“环渤海”以山东省为例,上涨27.3%,从1500元到1910元(见图2)。我国民营加工贸易企业最集中的三个地区最低工资平均上涨近三分之一(31.8%)。2019年初,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指出,加工制造业是2018年五大注销企业数量最多的行业之一,从事这个行业的大部分都是民营加工贸易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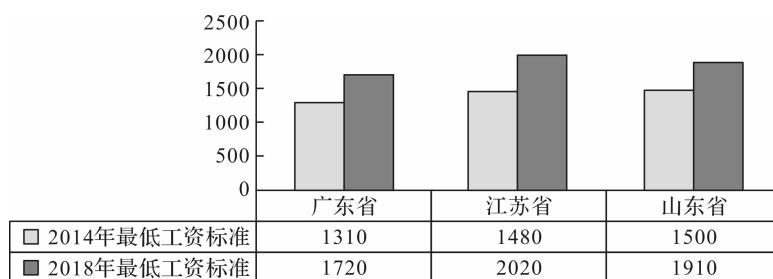


图2 2014—2018年广东、江苏、山东省最低工资标准变化

(四) 企业迁出国外,知易行难

国内有些民营加工贸易企业希望通过从国内搬迁国外的方式,实现使企业从“自贸区外”到“自贸区内”的角色转换以规避关税及非关税壁垒^[13]。2018年初,中国“加博会”调研报告显示,23.2%的企业有异地搬迁计划,其中,8.9%更倾向于把企业迁徙到国外。在有计划搬迁出国的企业中,把东南亚当作企业拟境外迁徙首选的占近一半。然而,东南亚各国虽与我国地缘相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较低。但是,这些国家多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国内工业门类不齐全,没有形成现代工业体系,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不足无法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基础设施建设普遍长期滞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有生产经验的管理人员短缺。同时,东南亚各国与我国风土人情不同,个别国家在历史上还与我国发生过多次战争。因此,民营加工贸易企业在这些国家开展生产和经营中,有的企业还曾多次遇到工人罢工险些演化成民族主义冲突的情况。

三、风险的应对机制

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是中国民营加工贸易企业突破逆经济全球化新特点下所遭遇困境的有效手段。政府引导是指政府做好顶层设计进行制度创新,通过加强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改善企业外部生态系统,为企业生存和发展提供法律及政策上的保障。民营加工贸易企业的经营者也应聚焦产业国际布局新动向,发挥企业家精神,利用市场机制求生存谋发展,嗅觉灵敏地去捕捉市场中的新机遇。

(一) 制度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1. 法规、政策创新。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环境中的食物链是物种生存和发展所依托的重要物质基础之一。同时,生物的成长也离不开阳光、水和空气。公司在企业生态系统中的生存和发展也同样依赖于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如企业的股东和员工、上下游配套企业、政府、消费者等。在企业生态系统中,政府承担着对企业的监督和管理责任。它制定的法律、法规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可以起到

引导、支持和监管作用。因此,针对民营加工贸易企业在逆全球化新特点下可能遭遇的生存危机,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摆脱困境是政府的责任之一。政府只有做好顶层设计才能发挥出引领和保驾护航作用,中国民营加工贸易企业才会有突破困境的方向和信心。

首先,法规创新。虽然,在我国加工贸易企业中根据企业性质,主要可以分为外企、国企、合资和民企。但是,由于我国历史的特殊性,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加工贸易企业大多是由改革开放初期从事“三来一补”的个体工商户或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的民企。而民营加工贸易企业长期以来很难可以像外企和国企那样,在产权保护和公平竞争等方面充分享受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因此,政府应该抓紧落实习总书记2018年11月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尽快制定和颁布《民营企业保护法》。以立法的形式保证,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都将享有同样的权利。这不但有利于推进我国法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且有助于稳定民营加工贸易企业对国家坚定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预期,增强企业管理者发挥企业家精神突破逆境的信心和勇气。

其次,政策创新。一是对外政策创新。在逆全球化新特点下,双边和区域性自贸协定正在逐渐侵蚀以WTO为核心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全球治理体系,加之中美贸易战以及美国利用“中美经济脱钩论”对一些国家施加压力进一步排挤中国。因此,推进贸易市场多元化,提高新兴市场占进出口中的比重将是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有力抓手。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应坚定不移地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在继续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市场外,还应利用美国的盟国们与美国在利益诉求方面并不完全一致的矛盾,分化瓦解反华排华势力^[14]。加快中日韩、中国与东盟等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以及推动中英、中法、中德等双边自贸协定谈判进程,积极为我国民营加工贸易企业拓展国际空间。

二是对内政策创新。虽然国内正在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但不应把所有的加工贸易企业从事的生产都当作落后产能淘汰掉,而应稳定和发展传统优势产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优化需要进行科学、合理的综合治理,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和满足就业需求。对于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面对世界政治和经济不断增强的不确定性,社会长期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不能只靠先进制造业来支撑。2019年前三季度,民营企业进出口占外贸总值42.3%,其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19.4%。另外,民营加工贸易企业还创造了几千万个就业岗位。可见,民营加工贸易企业对我国现阶段稳外贸、稳就业目标的实现还是有较大贡献的。美国在2019年9月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价值5500亿美元的商品再多加5%的关税后,首当其冲受到这项政策影响的就是国内的民营加工贸易企业。因此,政府应当对逆经济全球化新特点下遭遇直接困难的民营加工贸易企业,出台行业性的“滴灌式”定向减税降费措施,精准降低在国民经济中还在起一定作用的民营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和运营成本。

政府如果能够坚持法规、政策创新,抓紧出台《民营企业保护法》,完善《专利法》《知识产权法》的实施细则,做好顶层设计,在实践中切实做到保护民营加工贸易企业和企业经营者财产权,维护竞争中性原则和保护知识产权,并针对民营加工贸易企业的定向减税降费措施适时实施分层对接,就能产生化学反应,为困境中的企业营造出更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促进更健康、更适合生存发展的企业生态系统建设。

2. 管理方式创新。在企业生态系统中,企业和企业的监管机构——政府所处的层次不同。高度决定视野,作为监管者的政府要比专注于生产运营的企业,对企业所处产业的变化更具有大局观,更容易洞察企业生态系统中某个或某些方面的改变可能给企业带来的外部冲击,通过事前预判帮助企业未雨绸缪准备好应对措施。在当前逆全球化新特点下,政府需担当起企业引路人和帮助者的责任,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第一,服务方式创新,设立专门研究和咨询机构,聘请在民营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领域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和学者,为企业提供转型和升级发展思路方面的专业性咨询。20世纪80、90年代,东南亚和

拉美各国纷纷推出“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利用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比较优势,抢夺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订单。韩国和台湾地区等的加工贸易企业当时也曾面临被迫转型升级的相似境遇。台湾地区政府当时立即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迅速组织专家、学者和企业对产业规划和构建进行研究。同时,通过购买的方式对民间产业发展研究机构的高水平相关成果也果断加以吸收。这些研究成果最终都免费提供给企业进行决策参考,台湾华硕等企业都受益于此机制,从当初的小、中型加工贸易企业,摆脱困境后成长为世界级生产服务型制造企业^[15]。因此,政府应设立专门研究机构对韩国、台湾地区等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的成功经验进行深入研究 and 总结,并将取得的经验提供给我国家营加工贸易企业作为借鉴,正确引导企业脱离困境。

第二,管理方式创新,奖励和补贴转型升级企业。对于可能因发达国家实行自贸区内产品一体化,被剔除出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民营加工贸易企业,政府可以通过提供各种便利化的方式完善企业的破产、倒闭退出机制,并对积极准备向新产业链进行转型的民营加工贸易企业予以引导和奖励;对于依然可能留在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中的企业,政府应通过技术改造补贴的方式激励民营加工贸易企业向“微笑曲线”的两端积极拓展进行升级,帮助企业尽快摆脱被“低端锁定”的窘境^[16]。

3. 金融监管、金融服务创新。在经济逆全球化新动向下,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有被发达国家发起和组织的区域性贸易和投资规则摆脱的风险。我国民营加工贸易企业面临着产业国际梯度转移的全球性可能转换为区域性;产品价值链的全球分解可能在区域内被完整构建的国际产业重新布局,转型升级势在必行。然而,企业转型升级无不需要以资本作为基础,而且企业还要承担转型升级不成功可能破产倒闭的风险。由于我国民营加工贸易企业长期以来主要从事的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生产、加工和组装工作,导致很多企业利润形成的资本积累不足。如果自有资本的有限性难以让代工企业依靠自身力量完成转型升级,那么对外融资就是企业获取资金的最佳途径^[17]。可是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中的客观限制,很多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实际上十分狭窄。因此,在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方面,政府协助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工具管制放松。政府可以允许民营加工贸易企业以固定资产为抵押或自行(或政府协助)联系担保方,以公开发行债券或在股权交易市场挂牌的方式,从一级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近几年,国内火爆的楼市、虚拟货币和P2P等金融产品,以倍增式或几何式增加的投资回报率吸引了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这不但显示出资本“脱实向虚”趋势明显,也说明社会资本充足。可是在逆全球化新特点下,力图通过创新创业进行转型升级而急需资金的民营加工贸易企业,却面临着一方面民间借贷“高利贷”式的还款利率,和另一方面国内银行和非银金融机构对中小民营企业贷款的重重限制。因此,企业常常陷于借贷无门的境地。随着国内近来加强金融监管,股市、楼市、P2P和虚拟货币市场回报率急剧降低。政府正可以借此机会因势利导通过金融创新,将社会闲散资金引导到民营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债券或股票上来。

其次,推动金融服务集约化、无纸化。提供便利化金融服务是优化民营加工贸易企业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商业银行和非银金融机构可以按照“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的原则,把为民营加工贸易企业提供的跨境金融服务功能进行集约化整合,推出“一站式”服务。在此基础上,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进一步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构建涉外金融服务数据平台,实现业务主体在线授权和认证、结售汇在线办理等线上无纸化金融服务功能。金融服务的集约化和无纸化可以有效促进金融机构对民营加工贸易企业服务的便利化。

(二) 内部挖潜,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

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并非固定,它的变化会改变生产要素成本,通过要素成本低获得的比较优势在长期中具有易逝性^[18]。目前,国内各种生产要素价格上涨迅速,人们对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观念也逐渐增强。中国民营加工贸易企业早期得以嵌入发达国家全球产业链的生产要素成本低廉的比较

优势,正在变得越来越不明显甚至逐渐丧失^[19]。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发达国家开始逆经济全球化而动,通过“一对一”或区域内各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破坏多边贸易和投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20]。在逆经济全球化新特点下,中国民营加工贸易企业经营需要发挥企业家精神,利用市场机制主动捕捉市场中的新机遇来摆脱困境。

1. 发挥企业家冒险精神,“借鸡下蛋”争取链内升级。产品研发设计、品牌运营、营销渠道和售后服务是全球价值链“U型曲线”的两端,属于技术、知识和管理含量高并能够带来丰厚利润的部分^[5]。中国民营加工贸易企业链内升级就是要摆脱长期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承担低利润、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状态,向价值链两端进行攀升进而形成控制。

首先,并购是加工贸易企业在资本条件允许情况下,掌握整个产品的全球价值链的最快捷、有效的途径^[21]。在经济全球化时期,有些民营加工贸易企业通过代工生产不但获得了丰富的发达国家知识和管理经验的溢出,而且也积累了大量剩余资本。同时,近年来国家外汇储备充足,人民币对世界主要货币始终币值坚挺。而发达国家经济在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后却复苏乏力,许多企业经营困难。我国民营加工贸易企业可以借助这个机会,依托自身资本实力或借助金融机构帮助和政府协助,通过兼并和收购,控制原跨国公司的整个全球价值链,完成向“U型曲线”两端的攀升和控制。在实践中,企业在并购前不但要对整个价值链的价值进行仔细评估,而且还要邀请专家、学者和同行先进对可行性报告做出反复和审慎的论证。并购后,即可将原跨国公司负责价值链两端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和服务部门的核心团体保留,自己仍还专注于擅长的生产环节;也可对价值链进行重新整合,将自己一部分人员安排进原跨国公司高端业务部门的核心团体中,在共同工作和学习中逐步掌握核心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7]。今天已经是世界企业500强的浙江万向集团,就是靠当年并购美国舍勒公司,从而完成了对机动车万向节从研发到售后的整条全球价值链的控制^[4]。吉利汽车集团收购瑞典著名汽车制造商沃尔沃公司,和蒙牛集团2019年11月成功并购澳大利亚婴儿奶粉巨头贝拉米公司,都是企业通过并购升级的好例子。

其次,收购国外知名品牌也是加工贸易企业实现链内快速升级的好选择,尤其是对因资本不充足而无法实现对整条价值链进行收购的企业^{[9]35}。通过对国外知名品牌的收购,不但可以迅速成为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并摆脱低级代工的企业形象,而且还可以依靠国外知名品牌在国际上已有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省却在品牌创立和宣传推广方面所需投入的大量时间、精力和资金^[19]。在品牌收购完成后,民营加工贸易企业可以通过与国外知名品牌原拥有方,建立全球战略伙伴合作关系的方式,使双方在合作中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企业还是专注于自己擅长的产品生产;国外知名品牌原拥有方继续负责品牌运营。在品牌的全球战略伙伴合作中,企业不仅能够获得长期稳定的订单,有助于精益化生产,还可以了解最前沿的国际市场信息(需求信息、售后反馈信息、消费者偏好信息和潮流动态信息等),以便培养和打造将来完全可以独立自主运营的国际品牌管理团队^[22]。福建晋江远祥服装集团就是以民营加工贸易企业的身份收购了“宗主”的国际知名品牌:2014年,晋江远祥收购西班牙第一运动品牌KELME,从KELME运动服的代工生产者上升为品牌的所有者。这是中国民营加工贸易企业收购国外知名品牌,从而实现价值链内快速成功升级的典型实例^[27]。

2. 发挥企业家学习精神,“送旧迎新”力求跨链转型。一国经济处在何种发展阶段决定了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发达国家利用对资本、技术、管理和信息等优质生产要素的掌控所获得的比较优势,主要从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服务型产品的生产和服务^{[9]51}。经济欠发达国家则依靠自然禀赋所带来的生产资料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注重于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当发达国家完成国内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后,就会通过对外投资方式,把已经在本国完成整个产品(产业)生命周期的产品(产业)的生产转移到新兴经济体国家,从而完成产品(产业)的国际梯度转移和全球价值链的跨国分解。同理,曾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国家也会把在它们本国已经完成整个产品(产业)生命周期的产品(产业)的生产再次转移到经济欠发达国家^[18]。因此,一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也决定了其在产业国

际梯度转移和全球价值链的跨国分解中的角色是转移者还是承接者。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适时进行制度创新,推出改革开放政策,通过设立出口加工区,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和解决大量剩余劳动力^[24]。在这一时期,中国民营加工贸易企业主要承接的是:由发达国家完成产业结构调整后再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然后又由“亚洲四小龙”在实现本国(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后再转移给我国的低利润、低技术壁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25]。这符合建立在弗农产品周期理论上形成的梯度转移理论中关于“一国(一地)经济处在何种发展阶段决定了其在国际(国内)分工中的地位”的论述^[2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多数民营加工贸易企业长期生产的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只有少数企业参与了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中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

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内土地、自然资源和初级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与改革开放初期的价格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些生产要素在全球经济中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逐渐缩小。与此同时,国际经济格局也呈现出新变化。在逆全球化新特点下,WTO主导的全球多边贸易和投资治理机制逐渐被各种含有排他性(甚至歧视性)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所架空^[27]。2019年10月,英国脱欧不畅和中美互加关税大战升级更为世界经济发展前景蒙上阴影。

跨链转型指的是,民营加工贸易企业在承接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产业国际梯度转移和全球价值链跨国分解中,放弃可能已经从事多年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进到利润相对丰厚、技术壁垒较高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服务产业,实现企业生产从低端产业到高端产业的不同产业链间的转换。面对国际和国内经济的新格局,中国民营加工贸易企业可以利用在代工生产中已经积累的资本和技术溢出、管理溢出,发挥企业家学习精神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并借助政府为推动和落实“创新驱动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战略而出台的各种优惠扶持政策,结合自身具体情况制定出跨链转型的可行路径^[28]。如:原来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企业努力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进;以前从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企业争取向知识密集型服务产业跨越。全球微波炉销量第一的广东格兰仕集团在1978年时还是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代工生产羽绒服装的乡镇企业。1992年,该集团进军家电生产市场,跨链转型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并在1999年发展成为世界排名首位的专业微波炉制造商。

3. 发挥企业家创新精神,“东成西就”实现域间腾挪。在经济全球化中,贸易和投资在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流动更加自由和便利,国际分工进入到国际要素分工新阶段。全球产业链可以将产品从研发设计到售后服务的每一个部分,按照不同国家在每一个环节上的要素比较优势,进行全球分解以获取要素收益最大化^[21]。但是,一国在某一时期拥有的要素比较优势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一方面,以本国为参照系,后期的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会比前期高,本国前期具备的要素比较优势在长期中会减小或消失。另一方面,以他国为参照系,随着一些新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不断地参与到国际要素分工中来,本国同这些国家相比在全球价值链中原本具有的要素比较优势可能会不复存在^[26]。

近来,西方国家利用专门针对一些国家的“歧视性”准入条件如“鼓励私权,限制公权”“禁止补贴国企”“取消资本管制”和“放松金融监管”等,企图用双边或区域化自贸协定架空 WTO 主导的全球贸易多边治理体制。逆全球化新特点带来的产业国际新布局从外部约束着我国民营加工贸易企业的生存。2018年底,东南亚国家中的马来西亚和越南开始享受到 CPTPP 协定国间关税降低95%以上的优惠,而我国则不是协定国之一。这意味着中国出口产品在进入 CPTPP 协定国市场时,要面临比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国同类出口产品高得多的关税。中国出口产品在这个市场中的国际竞争力将大打折扣。2019年8月,在美国宣布的最新一批对华加增25%关税的价值3000亿美元3805种进口商品的清单里,家用电器及零部件、服装及饰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都赫然在列。而在我国从事这些类产品生产的正是民营加工贸易企业。

面对国际经济新格局带来的外部约束,在调研中发现许多民营加工贸易企业开始奋起自救。有的为了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引进国外先进生产设备;有的为了降低人工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不惜重金进行生产线的自动化改造,甚至在生产中开始广泛使用“机器人”。但由于厂租、管理费、原料价格等经营和生产费用暴涨,以上那些努力都没有能有效地阻止企业业绩的快速下滑。

“飞地经济”模式可以为民营加工贸易企业向我国中西部搬迁打开新思路。一方面,政策支持。2015年国家发改委和2017年国家发改委联合七部委,都相继出台过支持利用“飞地经济”模式加强我国区域合作工作的指导意见。另一方面,条件具备。我国加工贸易企业在区域分布上差异明显,位置处于东部沿海省份和直辖市的企业达九成以上,而只占区区不到一成的加工企业地处我国中部和西部的省份和自治区。民营加工贸易企业可以成功地利用“飞地经济”模式向中西部搬迁是因为:一是地理位置相近。相比迁徙到东南亚国家,国内搬迁会减少大量两地政府和两地企业的沟通障碍。二是成本落差大。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在人工成本、土地成本和管理费用等方面落差至少超过三分之一。三是发展时机相随。东部的加工贸易已经发展成熟,而加工贸易在中西部方兴未艾正适合承接产业的梯度转移。四是优势互补。东部加工企业有技术、管理和资金优势,中西部有丰富土地和人力资源且价格低廉。通过向中西部搬迁,民营加工贸易企业不但能大幅减少厂租和管理费等经营费用提升企业财务业绩,而且还可以有效促进我国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和就业。

四、结 论

在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单边主义、重商主义贸易思想挑战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区域性(具有排他性、“歧视性”)自由贸易协定蚕食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和投资全球治理体制和规则的逆经济全球化新动向下,中国民营加工贸易企业不但要面对国内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生产要素价格上升使其在国际分工中比较优势下降的压力,而且还要面对因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可能进行区域内重组被边缘化和剔除出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外部冲击。

在经济逆全球化新特点下,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制度创新优化营商环境:第一,法规政策创新。抓紧出台《民营企业保护法》和为民营加工贸易企业进行“滴灌式”减税降费的政策。第二,管理方式创新。设立专门研究和咨询机构,为企业转型和升级指明发展方向。第三,金融监管和服务创新。政府允许出口加工型民营企业在一二级市场进行直接融资。另一方面,民营加工贸易企业经营者应发挥企业家学习、创新和冒险精神,利用市场机制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首先,通过并购控制整个价值链,或收购国外知名品牌实现链内快速升级。其次,实现产业链间向上转换,转进到利润丰厚、技术壁垒较高的产业。再次,中国民营加工贸易企业可以考虑将企业搬迁到我国中西部地区完成企业战略转移。因此,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与企业家发挥学习、创新、冒险精神是民营加工贸易企业突破逆全球化新特点下所面临困境的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 (2018-06-23) [2018-11-08].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6/23/c_1123025867.htm.
- [2] 吴志成, 吴宇. 逆全球化的演进及其应对[J]. 红旗文稿, 2018(3): 32-34.
- [3] 戴翔, 张二震. 逆全球化与中国开放发展道路再思考[J]. 经济学家, 2018(1): 70-78.
- [4] 聂名华.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升级方略[J]. 东南学术, 2017(2): 127-134.
- [5] WIERCZEK A. The Impact of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on the Snowball Effect in the Transmission of Disruptions: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the Mode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14, 157(11): 89-104.
- [6] 裴长洪, 刘洪愧. 中国怎样迈向贸易强国: 一个新的分析思路[J]. 经济研究, 2017(5): 26-43.
- [7] 杨春, 李箐. 中国代工企业突破“低端锁定”途径研究[J]. 商学研究, 2018(5): 23-28.
- [8] 马克思. 资本论[M]//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36-37.
- [9] HOEKMAN B. The Global Trade Slowdown: A New Normal? [M]. London: CEPR Press and EUI, 2016.

- [10]张燕,谢玮.国际人士看中美贸易摩擦:中美激烈的贸易争端可能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J].中国经济周刊,2018(13):31-32.
- [11]龚锋.我国外向型代工企业实施战略转型的方向与思路[J].宏观经济研究,2012(4):28-32+71.
- [12]易先忠,包群,高凌云,等.出口与内需的结构背离:成因及影响[J].经济研究,2017(7):79-92.
- [13]杨春,李箐.中国外向型代工企业当前逆境研究——基于逆全球化新特点视角[J].西南金融,2019(11):13-20.
- [14]徐世腾,陈有志.“一带一路”国家经济联动效应研究[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8(2):99-108.
- [15]张幼文.新时代中国国际地位新特点和世界共同发展新动力[J].世界经济研究,2017(12):24-30.
- [16]盛垒.疲弱复苏的世界经济:新变量、新趋势与新周期——2017年世界经济分析报告[J].世界经济研究,2017(1):3-17.
- [17]杨春,李箐.声誉资本影响企业财务绩效吗?——来自417份调查问卷的证据[J].征信,2020(1):41-48.
- [18]GEREFFI G, HUMPHREY J, STURGEON T.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5, 12(1):78-104.
- [19]戴翔,张为付.全球价值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外贸发展方式转变[J].经济学家,2017(1):39-46.
- [20]杨春,李箐.企业社会责任促进声誉资本形成的实证分析[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65-68.
- [21]ACEMOGLU D, ANTRAS P, HELPMAN E. Contracts and Technology Adop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97(6):916-943.
- [22]KOOPMAN R, WANG Z, WEI S. 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2):259-294.
- [23]杨春,李箐.我国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61-65.
- [24]李文锋.改善外贸供给侧结构,培育竞争新优势[J].国际贸易,2016(9):8-12.
- [25]裴长洪,刘洪愧.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研究,2018(2):4-19.
- [26]DAUDIN G, CHRISTINE R, DANIELLE S. Who Produces for Whom in the World Economy? [J]. Guillaum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1, 44(11):1403-1437.
- [27]张二震.中国如何攀升全球价值链[J].江海学刊,2017(1):230-233.
- [28]梁文化.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影响自主创新的门槛检验——基于吸收能力视角[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9(3):68-78.

Where is the Way for Private Processing Trade Enterprises? ——Coping Mechanism in the New Context of Counter-Globalization

YANG Chun¹, LI Qing², LI Feng¹

(1.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4, China;

2. Business College of Australia and Asia,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er-globalization of economy that is initiated by the private sectors as a new feature and promoted by the government, bilateral or reg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begin to break up the multilateral trade and investment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with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s the core. China's private OEMs will face the marginalization and exclusion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and value chain due to the possible intra-regional reorganization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and value chain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It is found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government can improve the enterprise ecosystem through the innovation of laws and policies, management means and financing channels. On the other hand, private OEMs should also play an entrepreneurship role and make use of market mechanism to upgrade within the egg-laying chain, send the old to welcome the new cross-chain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fer strategies from east to west.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enterprises to strengthe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power by practicing their quality skills.

Key words: global value chains; gradient transfer; private enterprise; system innovation; counter-globalization



(责任编辑 韩玉志)